

溥仪接着说：“最近时局不稳，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请‘王爷’到静园住几天。”饭后溥仪谈到：“楚汉相争”的故事，大意是：“刘项相争时由于刘邦一时疏忽大意，以致太公、吕后被项羽所虏，被当成‘人质’，刘邦为了争天下只好置于不顾，险遭项羽所杀害。”当时因为溥仪闲谈时常用汉光武帝刘秀、唐太宗李世民等来比喻他自己（因为那时包围在他左右的“遗老”们经常引用那些“创业”、“中兴”的帝王来吹捧溥仪，以期得到他的欢心而达到他们升官发财的可耻目的）。所以听到那些话也毫未介意，当天就住在“静园”了。

第二天夜里，忽然听见枪声大作，我父亲被惊醒后急忙要找溥仪询问原因，被溥仪的随从人员所阻拦。直到次日才送来溥仪留下的一封信，内容：“我已于今晚乘船经旅顺转赴沈阳，沿途有人保护，请一切放心……”我父亲见信后惊慌失措，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。以后在“静园”又住了几天，感到生活不便，就回到原住所去了。

溥仪怎样成为“笼中天子”

李国雄 口述 王庆祥 整理

野心勃勃的静园寓公

溥仪在天津时期已经感到了组织军队、武装实现复辟的必要性，但作为日本租界内的寓公，他除了联络军阀，再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。为了渲泄心中的郁闷，溥仪找到一种“纸上谈兵”的方式。从“张园”到“静园”，他一直在几张八开大

白纸上布阵，委派高低指挥官、调动敌对双方的将领。他常把这种纸上的军事行动做得很认真，例如指令某军向某军进攻，乃用两色笔分别标明攻方的进攻能力、战术即偷袭还是侧面攻击，以及守方的防御兵力、阵地方向等等。双方胜负当然都由溥仪决定，叫谁胜、谁就胜了；叫谁败，谁就败了。过一两天，溥仪还让再把布过阵的纸找出来，使战斗继续进行，如某方增加兵力多少团，某方变幻战术怎样，于是胜方又转胜为败，而败方则转危为安……纵然局势大起大落、瞬息万变，溥仪照旧躺在床上，在床头小桌边，在一盏台灯下，勾勾抹抹……因为溥仪布过阵的白纸并不信手丢掉，所以我相信在有关档案中还能找到它们，证明当年的溥仪力虽不足，心则有余。

1931年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，溥仪的复辟思想也更加突出，遂常常派出人员四处打探消息，窥测方向，以求一逞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后溥仪接连派出三批人员，一批在天津市内活动，一批派到日本国内，还有一批前往东北。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，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他部门的消息，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，此即佟济煦。他到沈阳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，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，向溥仪报告说：“时机已至，切莫迟疑，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，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，盼皇上幸临！”他说着，双手捧起用手帕包着的一块土进呈溥仪，“这是奴才从东北带来的一块宝土，皇上得到这块土，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！”

这个动人的“献土”故事，是在伪满初年溥仪亲口讲给他的几位侄子们听时，我因值班正当其侧才把来龙去脉全听明白了。溥仪还很动情地说：“佟济煦跪在地上向我递土时满脸淌泪，堪为壮士之举。我接过土来，用鼻子闻闻，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……”溥仪把这块土视为珍宝，又从天津带回东北。

记得有一次溥仪让我找东西，从某箱笼中翻腾出一个黄布小包，打开来看，里面有个约10公分见方的土块。我因好奇便故作不知地问溥仪：“这块土是干什么用的？”溥仪说：“这就是佟济煦从奉天给我带到天津的那块土呀！”

溥仪出关之前

我上楼面见溥仪销假，正赶上他坐在“恭桶”上大便。溥仪在紫禁城使用的恭桶是锡金属方匣子，有3米来高，里边放些锯末，便完加盖，由殿上的端出倒掉再用水冲净，加上锯末备用。到天津以后改用高装搪瓷便盆，便后由随侍倒。欺负人的是，端恭桶者必须高举过顶，以示尊重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溥仪边拉屎边问。

“奴才回来了。”

“脚伤治好了么？”

“没好利索。听说天津事变，恐怕园子里出事，就赶快回来了。”

“来得正好，我要走了。”

“万岁爷往哪方启辟？”

“甭多管！今儿晚上动身。”溥仪拉完尿，在一旁值班的祁继忠立即上去伺候。溥仪系着裤带对我说：“你一宿没睡觉了，躺下歇歇吧！”于是，我混身打混身，就躺在地毯上了。

由溥仪要走我想起脚伤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。溥仪突然命令我和另外几个随侍，立即把全部现在不使用的行李、家具打包装箱，他不说原因，好象要搬家，但实际没有举动。过了几天，溥仪把我找去，问道：“你能打开车库里那扇大门的锁头吗？”

“奴才没有钥匙。”

“可以把锁弄坏，别叫旁人知道。”

原来，日本租界方面对静园的警戒部署也和张园差不多，大门外有专为租界地服务的中国警察的哨位，大门里的门房中则住着一个分秒不离的“白帽”。溥仪想避开监视非另寻通道不可。恰巧静园车库有扇通院外的大门，这扇门自溥仪搬来就锁着，从来不曾打开过，钥匙也不知放在谁手。溥仪让我弄坏的就是这把锁。或许是因为习武增强了臂力，我很快就办好了这件事。

“奴才听万岁爷的吩咐，已经把锁卸下来了。”

“先别开门，从正门出去绕过来看看，不知门外站着人没有？别叫闲人瞧着。”

我按吩咐绕过去一看，闲人倒没有，只是有两扇大门的中缝处严严地贴了一张大广告画。向来这里没贴过东西，再说也不是贴广告的显眼儿地方，可以断定是新贴的，有人出于广告以外的意图干的。

我原原本本向溥仪报告了情况，最后说，如果开门，广告画将被撕开，这扇门的秘密也就暴露了。溥仪垂头丧气地说了一句：“算了吧！”

后来我才明白：溥仪让我们打包装箱，那就是已经打定了出关的主意。让我开车库门，是要躲开“白帽”的眼睛。因为“白帽”是日本驻津领事馆派驻“静园”的警察。当时在溥仪出关问题上，领事馆接受日本外务省指示，认为时机不成熟，不宜轻动；驻屯军司令部则受国内军部指导，积极诱引溥仪出关，建立傀儡政权。双方矛盾很尖锐，溥仪既然倾向于驻屯军，则必须背着领事馆，背着领事馆的耳目——白帽。

在跟随侍们闲聊，得知这些天静园发生一连串怪事，最怪的是炸弹事件：有人送来一蒲包鲜货，由祁继忠接手并送到溥仪跟前，打开盖子惊叫一声：“炸弹！”赶快送交“白帽”，再找送货人已经不见了。现在知道这件事是日本军方故意做的，目

的是催逼溥仪上路。我怀疑祁继忠参预了策划，怎么那样巧，炸弹接在他手里，又放走送货人？

溥仪的奏事官张宏志也在接到炸弹前后出事了。早就有人说他与国民党官方有勾结，溥仪也怀疑过，但谁都没有真凭实据，证明他就是国民党派在溥仪身边的暗探。溥仪离津前几天，张宏志请假外出，溥仪不但没有准假，还派人暗中监视他的行动。果然，张宏志找个空子就溜出了静园。溥仪接到监视者报告，即派两名护军随巡捕（日本租界内的中国警察）跟踪并将其抓获。

“你干什么去啦？”溥仪讯问。

“想出去买点东西。”

“告诉过你不准出去，为什么还要溜出去？”

“奴才任罚。”

“回自己房里呆着，不准离开一步！，听明白了么？”

“奴才明白。”

这场讯问发生在上午，不料张宏志趁中午防备松弛又溜了，从此下落不明。遗憾的是尚未来得及问明细节，谁都解不开疑团了。总之，多年守在溥仪身边的人亦不可靠，岂能不令他心惊肉跳？

赛车后厢的秘密

炸弹迫使溥仪做了最后的决定，而且，行动也更加谨慎小心了。

回到天津那天晚饭前后，溥仪向我布置了一个神秘的任务：晚8时整，把赛车发动起来，同时打开后厢盖子，不准提前，也不准错后。

“谁开车呢？”我多嘴问了一句。

“甬管！有人开。”溥仪面孔严肃。

溥仪所说的赛车，正是我经手“打价”花1.5万元买进的那辆敞篷车。该车前部司机篷内只有一排座，除司机再坐一人。后部从外形看是平的，其实是两扇盖子，打开来，再利用车前的两根立柱，顿时可以支起一个帆布篷子来，里边还有一排活动椅，可坐两人，象一部小客车，关上盖子就什么都没有了，盖子底下顶多能有1米长、1米宽、0.6米高的一块空地方。

溥仪连司机篷都不肯坐，让我打开后厢盖子的意思，显然不是要支起帆布篷，或许是要钻到后厢盖子底下去吧？

晚8时整，我准时发动了车子，打开了盖子，然后呆在一边，心里还琢磨：究竟让谁开车呢？

忽然，一条人影在车库前闪了一下，迅速向赛车走来。

“谁？”我发问。

“我——佟功永！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开车！”

“谁让的？”

“不是说老爷子今晚要走么？”

我知道这是安排好的，溥仪对我也不细说，不便多问了。可心里不太服气：佟功永并不是司机，是静园一名护军，有时抓车玩玩，摆弄几回，论开车技术还不如我呢。

正寻思着，溥仪由楼内快步走出，祁继忠紧跟在后边。我迎上去告诉溥仪说车准备好了，溥仪“嗯”了一声，迅速钻入后厢空内。不料，祁继忠也三步两步地窜了上去，连一个人也难放的地方怎么挤得下两人？何况都是大高个！我想，万岁爷窝在后厢底下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明白吧！只见祁把后盖放下后，屁股紧顶盖门，忽闪忽闪地摆不平。事情紧急，我也顾不

了太多，跳上去一使劲儿把盖子按严了。佟功永遂把车子由正门开了出去，“白帽”看了看，只有司机一人，他哪里会想到“私货”藏在后厢盖子底下！

我没有立即返回楼里去，继续呆在车库旁观察动静，我意识到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。过了约15分钟，赛车开回来了，我帮佟功永入库关门，收拾完毕。

“车开到哪儿啦？”我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！”佟回答说，“只告诉我行车路线，出门后还有别的车领着，最后进一家旅馆大门。我心慌意乱，汽车刮在大门上，差点儿把旅馆的门给刮掉了！”

我心里好笑，不知溥仪搞什么名堂，不找正经司机，硬是要挑象佟功永这样半通不通的人开车，出点儿事故岂不毁了！

不过，我当时还不可能想到：这个晚上，对溥仪个人、对中国近现代史，竟是那样重要！一部赛车把溥仪送进罪恶的深渊。长期以来，为了掩饰自己，溥仪蓄意把赛车后厢说成是被日本人“劫持”的证据。后来，经过改造的溥仪自己纠正了这种说法。作为历史的见证人，我也能证明溥仪不是被劫持的，虽然他曾经受到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诱骗和逼迫，但是，赛车后厢的秘密却是他自己策划、自己实行的。

次日上午，婉容的太监来传，我在通往婉容房间的走廊里，见她坐在一把椅子上。

“什么事呀，老爷子？”

“你看，皇上也走了，王爷也不来了，把我放在这儿谁管呀？”婉容说着说着抹开眼泪了。

“老爷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奴才，奴才给老爷子干。”

“那好！园子里的事你先担待着，我今后有事也要找你。”婉容还是一边说一边抹眼泪。

溥仪走后，不但载沣王爷不再来，“行在”的管家人——总务处任事胡嗣瑗也不知所终。又受皇后面托，我只好临时扮充“静园”主事人的角色。园子里有日常事务，错综复杂的往来关系，还有警卫问题、下人的吃喝问题、司房款项收支等，静园是个乱摊子。

婉容离津与川岛芳子

我“受命”主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还要不要给溥仪传膳？溥仪已走，当然无须再吃饭；但如停止传膳，溥仪离津的消息就会立即公布于世。怎么办呢？当时二姨在，她也是溥仪最信任的人，我就找她商量，决定照常传膳，将膳食放在二姨房里，由她把各样菜都扒拉扒拉，象溥仪吃过的样子，以掩人耳目，直到报上公开登出溥仪到达东北的消息，才不演传膳戏了。

也是“受命”主事那天晚上，忽然枪炮齐鸣。如果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那回我还若无其事的话，这回可不同了，我感受到肩上的担子，有一种难以自抑的责任感。在屋子里坐不住，我便到院内溜来溜去。正当我迈开步子，“啦”的一声、顺裤裆打过一发子弹去，把对面一个坛子崩得稀碎，吓得我腿肚子打战。细一琢磨，也不对呀！如果这枪炮是中国军队放的，应该往北打；如果是日本军队放的，应该往南打；然而这颗崩碎坛子的子弹，是从法租界向日租界方向打的，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解不开的谜。

溥仪走后第10天，给我写来一封亲笔信，是胡嗣瑗带来的，但没有直接交给我，经别人辗转传递。原信不复存在，但内容我几乎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：

李国雄：我走到哪儿你知道吗？我由天津到○○，又由○○

到○○○。

这信实在令人费解，既不知道他到了何处，更不知道他想告诉我什么。但确是他亲笔，毫无疑问。这封信的谜底是我到旅顺以后才揭开的：溥仪写信时正住在汤岗子对翠阁旅馆，他要告诉我的是已由天津到营口，又由营口到汤岗子。然而日本人不许他披露行止，只好写“圈儿”信了。

此后，溥仪又通过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翻译官吉田忠太郎，多次向我传达指示，让我干这样，做那样。

又过了些日子，静园总务处任事胡嗣瑗拿着一封信，先找着庶务处任事佟济煦，两人又一起来找我，对我说：“这是皇上的亲笔信，你把它交给皇后，并通报一声，现有两人已经到园，要面谒皇后。”我想问问来者何人？是男是女？姓甚名谁？答称“不许过问”。继而又说“皇后一见这信就明白了”。我很觉得奇怪，毕竟自己是奴才身分，碰上这种口气，虽说临时主事也不敢坚持什么。

佟济煦向我告知这件事的时候，要谒见皇后的人正站在主楼前的台阶上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人禀告皇后了。随后，就见一位头戴礼帽、西装革履的青年由一日本人陪同，上楼直奔婉容房间。谈话约有20分钟，客人走了，他们说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半小时后，婉容的太监来传。叫我去见皇后。

“老爷子传奴才有事吗？”

“十四格格来了，就是那个穿西服的。”十四格格即肃亲王第十四女爱新觉罗·显玕，又名金璧辉，因过继给川岛浪速为养女，在日本长大，遂改名川岛芳子。她就是当年名声显赫的“男装丽人”，这个穿西服、戴礼帽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半点儿都没有怀疑他竟不是男的。婉容接着说，“十四格格捎话来，皇上让我去呢！今儿晚上就走。这事儿还要保密，皇上怎么走

的我也怎么走。你把车准备好，到时候开到吉田翻译官家，别的不用管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晚上8点整。”

记得那是个寂静的晚上，连续多日稀稀落落的枪声突然在这个晚上停了。像上次送溥仪一样，当晚8时的钟声响过，我启动了那台赛车，打开了后厢盖子，等待皇后驾临。婉容来了，只见她手按车身，“噌”的一声纵身跳进后厢，我万万没有想到关键时的皇后竟有如此利落的动作。当然，从平常那种娇柔作态的样子，怎会看得出呢？我遂放平后厢盖子，里边只有她一人，且比男人瘦小些，多少能透透气来，但也不会太好受。

我顺利地把赛车从正门开出去，因为这种车本来就是一种玩玩的东西，平时既不用于拉货，更不用于拉人，所以出来进去并不引起人们怀疑。开到吉田翻译官家门口，刚停车，吉田家的差人就过来拽我，我理解他们的意思：或许以为我是局外人，傻开车的，并不了解后厢的秘密吧！于是吹吹拍拍要把我引开，我竟不理这茬儿，几步窜到车后，双手提起后厢盖子。已经到了目的地，哪能还让皇后在里边闷着？

十四格格又出现了，这时已经恢复了儿女身，着旗袍、挂项链，果然是位相貌出众的小姐，她由吉田的女儿陪着，到车前迎接皇后。婉容也象上车时一样，轻扶车身，一纵便跳了出来，还是那样利落。

“老爷子还有事情吩咐吧？没事的话，奴才这就回去了。”

婉容由川岛芳子等簇拥着，将要往屋里进时，我用这句话告别。不等婉容启齿，川岛芳子开口了：

“你等等！”

她们进屋后，我就等在门口。过了约摸五六分钟，川岛芳

子出来了。因得以“正面相见”，我几乎憋不住笑：这女人竟在脖子上挂的项链下面挂了一串钥匙！

“听着：你回去给皇后取样儿东西——一条狐狸围脖，跟张妈要就行，马上送来。”

川岛芳子说完转身去了，我似乎听见那串钥匙因脖子扭动而哗哗作响的声音。我说声“是”，便开车返回静园。拿了狐狸围脖，我懒得再动车，索性走着送去。静园距吉田家仅一里多地，10分钟就走到了。我把围脖交给吉田翻译官，他回说一句：“没事了！”

踏上险途

这回我成了静园内名副其实的“老大”了，内心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愉快感。从吉田家返回静园的路上，有个杂货铺，我走进去跟掌柜的打了招呼，买了一袋花生仁、一袋五香瓜籽。一脚迈出杂货铺门坎，“轰”的一声炮响了，寂静的夜晚又被震破。

“静园”仍由溥仪遥控，吉田忠太郎是中间传话人。按传话内容：我照料园中日常事务。

婉容离津后20余日，吉田又携溥仪亲笔信来园找我，溥仪在信中命我携霍庆云和三名护军，以及伺候婉容的刘妈、张妈，共7人，速往大连。

溥仪和婉容先后离津，我又要离开天津了。我们身分迥殊，却踏上了同一条险途。

当即确定了行期。吉田还给我开了一张日本驻屯军兵营的证明信，并说：“从天津到塘沽，其间发生问题，把这封信交给塘沽日本驻屯军兵营即可，自然有人出面保护你们。在塘沽上船后即行作废，你务必收存好，不要叫别人看见。”我便小心翼翼装进衣袋。

我们一行7人上午离津，乘火车于下午4时许抵塘沽，随即登上日本商轮某某九号。因吉田先有洽商，登车上船都顺当。

我总感到责任重大，始终不敢疏忽。上船后先把刘妈、张妈安排在底舱，我嘱咐说“外边人员杂乱，你们没事别上去乱走。”

我和几名护军住在第18号舱，刚把行李物品安顿好，甲板上过来两名满脸凶气带着“家伙”的人，在我们舱门口看看就要进屋，我给拦住了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因为是中国人的，我估计他们是岸上稽查处的，心想：绝不可暴露身分。能应付则应付，万一弄僵了，打定主意不下船。塘沽不是租界地，是受中国军队管辖的，下船就麻烦了。只要赖在日本船上，他们没辄。

“你们的人带了几十万现金上船，我们奉命来索回这笔钱！”听来人这么一说我倒放心了，原来不是冲我们来的，他们并不了解我们的身分。

“别说几十万，我们连一万也没有！”我说的确是实话。

“我们的人一直跟着，绝不会错！”那两人语气肯定。

“那你们就翻吧！”

“闪开！”

一个包一个包地被解开翻过，里面全是果品、点心等物。身上的衣兜也全翻了，没能达到目的。这时，我多了一句话，我说我们上船时18号舱本来有人住，为了给我们腾房才搬到隔壁去了。那两人发现这个线索赶快冲向隔壁，门锁着，遂找船长联系，日本人船长不予理睬，急得那两人团团转。我向几名护军交代说，只要不拿我们的东西，无论出什么事情都不管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暴露身分。

原来那两人确是塘沽港稽查处的，负责在码头和过往船只

上追查走私罪犯。然而，日本船持不配合态度，我们也得以在这种保护之下，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。

夜11时，汽笛长鸣，载着我们的日本商船，愈来愈快地驶向黑暗之中。

几十个小时的海上生活过去了，这条日船就要停靠大连码头时，船长忽然装起糊涂来，他来到第18号舱门口，向我们扫了两眼。

“你们，什么人的干活？”

“到大连看看朋友。”

这位前来“履行职责”的船长，居然连个表面上的样子也装不象。他还进舱打开两只箱子的箱盖，马上就关上了。其实，他早从吉田那里了解了我们几人的身分，也清楚地知道我们要去找谁。与其说他有责任查问我们，勿宁说一路上他必须保护我们。

船停靠码头时，同行的7人全部聚齐，各人带好了东西，下了船。

临行时吉田曾告诉我，在大连下船即会有人接应。现在果然见到了来接应的人，原来是罗振玉之子罗福葆。我们刚登上码头，便被他迎进准备好的汽车，一直开到墨缘堂。这是罗家售卖古书、文具的店铺，那时已成为和溥仪有关系的人来来往来的歇脚站。在那里我们见到了罗振玉。罗道声一路辛苦，嘱我们几人暂且休息。几个小时以后，罗又雇了一辆汽车，载着我们奔驰在通往旅顺的大道上。我长舒一口气，似乎就要卸去肩上的担子了。

从旅顺到长春

1932年3月2日，溥仪传我。

“又要搬家，你现在开始准备。”这件精心安排的事对我来说却是突然的。

“搬到哪儿？”

“长春！”

溥仪向我简要地布置了任务：由我率领护军和茶膳房人员并携带溥仪急用的东西先行赴长，以便为溥仪的到达打前站。

“皇上几时启跸？”

“还不一定。”

大概还要保密，我不再问，当即动手把溥仪现用的衣物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几只皮箱，向溥仪报告后他同意，幸好没有笨重物件，路上也轻便些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带着霍殿阁、霍庆云等五六名护军及御茶膳房人员数人，由一名日本宪兵引路，在旅顺火车站登上一节铁闷罐车，携带的皮箱及其他物件，由车站搬运人员给装到这节车上。铁门刚刚关严，火车便轰隆轰隆地驶离了旅顺。

闷了一个多钟头，到达大连车站，这才允许我们进入客车车厢。我四外一扫，车厢内几乎满员，但都不象一般旅客，又并非清一色军人，这究竟是一列什么车，我始终没搞清楚，也不敢乱打听，坐着走就是了。经十五六个钟头的行程，抵达长春。其时，日本人已经改称长春为“新京”了。

一辆拉货汽车把我们几人，连同皮箱及其他物件，一起运到位于五马路口的原吉长道尹衙门内。这里就是伪满政府的临时所在地，因正处在中国地面与日本租界的交叉地带，是繁华的闹市区。

不知道溥仪几时到达，而他一到就要吃饭，所以我不敢怠慢，立即安排御茶膳房人员把工作条件准备好。同时安顿几名护军和伺候婉容的老妈子各自住下。我就和护军们住在一室。

这个伪满洲国真是在匆忙之中建起来的，连作为“中央机关”的“执政府”还是破破烂烂的，正在装修粉饰之中。我们中国人的住处没有床而是地铺，垫上草、铺上毯子，席地而卧。心中颇觉不平，便特意到日本宪兵的住处去看看，日本人不是地铺，而是铁床，条件好多啦。我又细看看，还有区别：我们中国人铺的是棉线毯，而他们日本人铺的是纯毛毯。我立刻就来了气：这样的小事上还分得如此清楚，太过份了！一气之下，我随便拽了一条毛毯就走，又把我那条线毯扔了过去。过后还听日本宪兵那边嚷嚷，问谁把他的毯子给换了？全屋都是毛的，偏偏出了一条线的，岂能发现不了？我也不言语，让他找去好了！

这里一切就绪，我又打听到溥仪住的房间——院里靠南端的两间，想去看看布置好没有。到了那里举目四望，真不怎么样：天棚低矮、房间狭窄，当时正在装修，我看见有几个人还往墙上贴缎子呢！这时，进来两名西装革履的人，大约是某报的记者吧？他们手托照相机，要给房间照相。这时，也不知从哪里得来了勇气，我跳过去加以干涉，不准他们拍照。我想，既然是溥仪要住的房间，我有权力管！把这样破烂不堪的模样弄到社会上去，有损于皇上的圣威。这时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以标准的北京口音搭话劝我：“你又何必管这些事！他们都是奉命而来，‘官差！官差！得罪了他们也没有好处呀！’我还以为此人必是与溥仪有关的，遂放下那边的事与他攀谈起来。原来他父亲是中国人，母亲是日本人，生在北京东四牌楼附近，从小说北京话，所以说得好，与溥仪并无干系。

这样忙忙乱乱地过了一两天，因为责任在身，是来为溥仪打前站的，生怕在哪件事上出了漏洞，于是，夜阑人静之际我又一件一件地想过一遍。觉得只有一件事情有缺欠：我们从旅

顺出来时，往闷罐车上装了许多筐苹果、桔子和其他水果，后来我们进入客车车厢，没留人在闷罐车看守，等到长春打开闷罐车门一查，水果筐丢了一半。据说让行李车上的人给偷吃了，他们要尝尝给皇上准备的水果是否会有特殊口味，谁又能奈何呢？其实光吃是吃不了太多的，有人不但敢吃还敢偷拿皇上的圣果，这也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件奇闻了。

溥仪就任伪执政前后

1932年3月8日下午4时许，溥仪携婉容还有他的几个妹妹，来到我们已经呆了几天的地方——伪执政府临时驻地。

那天晚上溥仪太忙了，人来人往不断。我本想靠前说说这几天的情况，竟找不到谈话机会。

不知什么原因，那天晚上溥仪并没有睡在给他预备好的两间居室内，而是住在典礼大厅东边的一套房间里。记得那是3个房间，溥仪在东间，婉容及二格格、三格格在西间，中间屋里立着三面很大的穿衣镜，次日早晨我过去伺候，见二格格和三格格在地下跪坐于自己脚上而对穿衣镜梳头呢！

这天上午，溥仪在典礼大厅举行伪执政就任仪式，现在说说我所看到的情景。

进入大厅时，走在最前面的是侍从武官，第二个人就是溥仪，他身穿后襟长、前襟短的那种西洋大礼服，头戴黑色礼帽。跟在溥仪身后的人中，离他最近的就是祁继忠，他作为贴身随侍参加了典礼全过程。人们进入大厅后，关了门，仪式开始。这时我在大厅外巡视，不时地听见里面一阵嚷嚷、一阵鼓掌，时间不算太长，大厅的各门都打开了，参加仪式的中国人、日本人一起涌出，我看见郑孝胥、罗振玉等老臣都在里边。人们顺走廊往西拐，出门是一个小院，军乐队的人在那里列队等待。这

时有个人从队列中走出，来到一根临时安装的旗杆之下，随着演奏伪满国歌的乐点，把伪满五色旗升上旗杆之顶。后来我才听说，升旗者原来就是曾任奉天市长、颇有声名的赵欣伯。升旗时，站在队列之前的溥仪脱帽敬礼，老臣们也冲着旗杆三鞠躬。至升旗毕，宣告礼成，参加典礼的人们又照纪念相去了。

溥仪在吉长道尹衙门改装的执政府呆了20多天，这期间门禁是很严格的，凭佩戴在身上的出入证通行。出入证长约4公分、宽1.5公分，有两种颜色：高级官员戴黄色的，低级官员戴白色的。不知怎么，给我也发了个黄色的，或许是执政的面子吧！有几次我从执政府那道圆门出来进去，岗哨一见我戴的黄色出入证，便十分严肃地喊出一声口令“举枪”，用以表示对“高级官员”的尊敬，这场面让我感到不好意思，以后没有要紧事再不出去了。

终于又下来一道命令，执政府从吉长道尹衙门搬迁到当时被人们称作“盐仓”的地方去。所谓盐仓，就是吉黑粮运署，有几栋小楼，在当时的长春算好房子。这次搬迁，内务方面由祁继忠负责，我的印象不怎么深刻了。

到新的地方，有了明确的职责分工，我专门侍候溥仪在缉熙楼内的生活起居，也只能在缉熙楼的范围内活动。溥仪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过勤民楼那边办公，起初还认真，往后“办公”时间愈来愈短，有时干脆不再过去。

缉熙楼是一栋二层戴帽的小楼，正门朝南、后门朝北，溥仪上勤民楼去都是出后门，越过中和门，直冲勤民楼的前门。

从正门进缉熙楼，对面便是楼梯，溥仪搬进去就住在二楼西侧靠南边的两个房间里。室内设备颇简单：寝宫内除了床、两开门大衣柜、带几层抽屉的衣箱和一个类似今天的酒柜的家俱外别无它物；会客厅里也只有书橱、花盆台子、双人及单人沙

发、小圆桌等家俱。桌上铺的不过是线织桌布，上面摆一套烟具。二楼西侧顶头是溥仪洗脸用的小屋，后来改为理发室。小屋南边是佛堂，溥仪常在这里接见近臣，佛堂旁边有卫生间。二层东侧归婉容使用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逾越的。

笼中天子

溥仪那时的生活实在很枯燥，虽然每天照例上勤民楼“办公”，鬼才知道到底有何公事可办，不到中午12点就“退朝”了，在缉熙楼休息时，与婉容、二格格、三格格一块儿说说话，娱乐一会儿。

有一天，溥仪心血来潮，说要出宫转转，遂命祁继忠备车，携婉容和二格格、三格格去逛大同公园（今儿童公园），奏事官吴天培也跟着去了。不料，象安装了特制机关，这边刚到公园，那边日本宪兵、警察、特务一起出动，成群结队的汽车一批批从四面八方方向公园包抄过来。最先赶上溥仪汽车的宪兵头目，恭恭敬敬地向“执政”行礼报告道：“此地不安全，请执政回府！”溥仪感到势头不对，无心贪恋公园景色，急命司机返程。此事并没有就此完结，又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方面传过话来，说执政的安全要紧，不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，要出门也得告诉一声，以便保护。话是这样讲，反正不许溥仪随便行动就是了。

溥仪有散步习惯，既然不许出宫，只好在大墙内遛遛。起初还好，散步时带上几名随侍就行。到后来，只要溥仪走出中和门一步，跟在他屁股后面的人就会愈来愈多，什么侍卫官、传从武官、日本宪兵……跟了一大帮。溥仪很反感，却又无计可施。我亲耳听他说过：“在院子里走走还拉着大队人马，这太没有意思了。”其实，这正表明日本人对溥仪的监督和限制愈来愈紧。

平日，溥仪散步并不局限于缉熙楼前前后后，时常越出中和门往北，上护军住的院子里去转。不久即有人告诉他，护军那个院子也不保险，最好不过去。接着，又出了这样一件事：有次溥仪在缉熙楼小院里散步，陷入了思考之中。刚走到东西大墙旁边，忽然由墙外飞入一块砖头来。因为四外都有岗哨，一般人不可能接近，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令人生疑。紧跟在溥仪身后的祁继忠和吴天培都害怕了，说是“闹鬼”、“狐仙显圣”，护卫溥仪赶快离开了这里。现在看来，这事与溥仪离津前的“炸弹事件”也大同小异。试想：谁能知道溥仪正在这里散步？谁又敢向“执政府”的院子里抛砖头呢？出这种事的时候又恰恰都有祁继忠在场也是怪事。从此，溥仪散步的范围更小了，因为还必须远离大墙。

溥仪并不傻，他当然知道是谁严格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。他不满，也只能忍受，因为理由是堂而皇之的，一切都是为了提供“保护”。出于同一考虑，关东军还派出若干日本宪兵长驻勤民楼旁厢房内，监视往来人员，包括溥仪的亲属和近臣。为了能在面子上过得去，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宪兵，不着军装，而改穿一种特制的制服。这些不易识别的人都经过了特殊训练，溥仪的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眼神之中。

溥仪终于想到，应该自己保护自己。他曾在天津张园练过几天八极拳，以后到静园、到伪满，连一次都不练，自身那点儿武术瞎了，但武术教师霍殿阁还在，溥仪身边会武艺的人也还不少。于是，溥仪又把他们召集在一起，让他们在勤民楼天井的空地上各练一回。那天我也在跟前看着，有十多个人分别练把式，真是五花八门、各显其能。霍殿阁压阵最后登场，溥仪及观者都对他寄予厚望，他也露出人前显贵的意思，起架很猛，而且练的并非霍家拳，是一套我不熟悉的把式。不料，因

开始用力过猛，中间缓不下架，到收架时已经站立不稳了，几乎栽倒，惹得哄堂大笑。溥仪问他失脚的原因，他解释说“奴才平时腿绑沙袋，已有二三斤重，今天突然摘去，未能适应，练起功夫来头重脚轻，才站立不稳。”据我所知，真实的原因不在于此，霍殿阁随溥仪到长春后，即被授为三等侍卫官，每年津贴1800元，乃忘乎所以，吸上了大烟，又娶上了小老婆，习武之人哪里经得住这般自我摧残？体质已在不知不觉中下降，过了几年，一位威武的拳师就出人意料地屈死于烟毒淫乐之中了。

观看武术表演后，溥仪感慨系之，觉得确有组建护军、扩充保镖力量的必要。

“御临幸”见闻

伪满十几年间，溥仪只有两种出宫的机会：一种是赴外省市视察，叫作“巡幸”，伪满最初二年不曾有过；另一种是在长春市内活动，如定期前往孔庙祭礼、前往建国忠灵庙祭祀日本侵略军的亡灵、出席协和会或其他会议的开幕式等等，叫作“御临幸”，这类活动从溥仪当上“执政”起，每年都有若干回。无论“巡幸”或“御临幸”，都由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精心安排。

作为溥仪的亲信随侍，从伪满初年起我就追随溥仪之后，在溥仪“御临幸”活动中广有见闻，仅挑两件有印象的事例说说。

就任“执政”不久的溥仪颇有“政治抱负”，为了表示“体察下情”的“圣衷”，特请关东军安排“到民间看看”。那次，他带着政府部门的一些人，按预定路线，来到南关某老百姓家。那家只有老两口带一个孩子，溥仪进屋后先接受主人行礼，东看看、西瞅瞅的，还按着孩子的头，说了几句抚慰的话。很明显，全部过程都是排练过的。

还有一次溥仪“御临幸”协和会某年度的年会，我带几名护军随行，以保卫伪执政兼“协和会名誉总裁”溥仪。记得会场设在一个大院子里，院内临时搭个很高的大棚，溥仪的“鹵簿”一直开进棚中主席台前，下车即登台进入后面的贵宾室。我们几名随行保卫人员即退至棚外，守候在大门口处。呆了不大工夫，忽听棚内“砰”的一响，显然是爆炸的声音，我和同来的护军不由分说拔出腰间短枪，三步并作两步闯进大棚中，直奔主席台。就在这时候见有一人被好几个人架着往外走，他一手捂住眼睛，另一只手拿着崩坏的闪光灯。一直跟在溥仪身边的警卫处长佟济煦，知道我们急了，赶紧过来告诉说：“没事！没事！”他又用手指指被架出去的那个人：“这位摄影师把摄影粉装多了，闪光灯爆炸，伤了自己的眼睛。”啊，原来是一场虚惊！回去以后我还曾向溥仪询问事情经过，他说也听见砰的一声，当时吓懵了，别的什么也没看见。溥仪那时也是可怜人，出门即有杀身之虞，不得不严加防范。

本来溥仪出门时的保卫工作由关东军方面包揽，但他不放心，希望在各种场合都能有自己亲信的人。

（摘自《长春文史资料》总第26辑）

伪满初期“吉林满洲 旧臣迎銮团”的一幕丑剧

胡蹄书

我国东北沦陷于日军之手，到了1932年3月初，快半年了。在这半年中，日本关东军日夕图谋建立一个听其摆布的傀儡政